

我为孙大总统授印

袁希洛

袁希洛先生，江苏宝山县人。他是1928年启东设县后的第一任县长。

希洛先生1905年留学日本东京，1907年参加孙中山先生在东京组织的中国革命同盟会。他在日本东京大学毕业回国后，积极从事革命活动。辛亥年，武昌起义成功。1912年一月一日，在南京举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大典，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与会的十七省代表公推江苏代表袁希洛先生为大总统就职时的授印代表。

这篇回忆录是袁希洛先生1957年写的《我在辛亥革命时的一些经历和见闻》中的第五节，标题是编者加的。

袁希洛先生在建国后，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于1962年1月29日病故，终年八十岁。

上海既发起组织各省代表团，商议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那时南京尚未光复，武昌黎元洪都督来电约各省代表赴武昌集会，我与陈陶遣、雷奋、马君武同乘招商局江轮赴汉口。该轮恐驶经下关时要遭炮击，故临时停航，乃又在镇江改乘日轮西上。在镇江旅店中，又遇到奉天代表吴景濂、直隶代表谷钟秀，遂同轮赴汉口。船经下关时，望见狮子山炮台上尚升着黄龙旗，远处隐隐有炮声。到汉口上岸，见北兵

拖着发辫，徒手在日租界沿岸徘徊。我们即住在日商旅馆，当天晚上湖北代表胡瑛等开欢迎会，说：“今天你们各位到汉口，这是近年最平静的一天。前数天，黄兴给冯国璋打败，冯军进入汉口、汉阳，在龟山架炮轰击武昌，黎都督退到洪山。前天晚上，冯军放火烧了黄陂街。昨天冯军尚放炮向武昌遥击，武昌未还炮，始停止”。次日陈、马、胡、谷四人去武昌，我与雷奋未去，在寓所等待。到了次日午后一时，陈陶遣回来，并与都督府秘书魏某（名字记忆不起了）同来。陈向我们说：“袁世凯派军使到武昌，与黎都督商谈双方停战，但要南京与武汉同时停战，因此派魏秘书来，请你们偕魏秘书在今天下午四时乘去上海的日轮赶回镇江，向程都督接洽，请他立即攻下南京，托下关江中的英舰以无线电通知武昌，与袁方停战。”我们即乘原来的日轮，四时东下，次日下午抵九江时，已得江西军探上船报告南京已攻克了。

代表团在二十多天內，差不多天天开会，制定了临时约法。袁世凯派人来运动各省代表要选举他为临时大总统。有的代表动摇了，但同盟会中出任代表的，多加反对。这时孙中山先生从欧洲回到上海，代表们决定选举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任副总统，乃于辛亥年十一月初九日开选举临时大总统大会，计到会的有十七省的代表，人数四十余人。这时马君武已改任广西省代表之一。我以当时代表团中未有秘书，故兼任笔墨工作，所有秩序单、当选票数记录，都是以粉笔写在黑板上，计孙文得十六票，黄兴得一票，盖以省为单位，每省投一票故也。这时，我又用墨笔在长方形毛边纸上，写“当选人孙文十六票”。于是，大家拍手欢呼，各省代表并将我拥抱高举，一同走出会场。次日，选举副总统，黎元洪当选。

孙当选总统后，提出改用阳历案，有少数代表说：“孔子说，用夏之时。自汉武帝时起，中国即用夏历到现在，已二千年，不可轻改”。我说：“孔子是殷的子孙，他反对周历，当时不能主张用殷历，所以来一个用夏之时。我们始祖轩辕氏，以甲子年、甲子月朔的一天冬至为岁首”而现在世界所用阳历，以冬至后第十天为一月一日，是与轩辕氏所定以冬至为岁首相近，不同夏历正月初一，要后冬至四十五天。于是多数代表决定改用阳历。

孙总统又提出废止跪拜礼，普通相见为一鞠躬，最敬礼为三鞠躬，全体决议通过。会议又决定以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一月一日，迎孙中山先生来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十一月十二日，我去江苏省都督府将篆刻好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捧回代表团，各代表团推我在总统就职时为授印代表。国旗也由代表团拟定为红黄蓝白黑五色，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表示五族共和的意思。总统府设在前清两江总督衙门，即太平天国王府。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即中华民国元年一月一日，孙中山先生由上海乘上午专车来南京，各代表于午膳后赴下关火车站欢迎，午后三时专车驶入车站，各代表登车欢迎，孙一一握手，专车即由下关入城，徐徐开车进抵总统府车站停车。各代表下车，拥中山先生入总统府大堂后花厅休息，此时已下午五点钟，室内已上灯了。各代表一面饮茶谈天，一面有人提议取纸笺自写某省代表某人，取总统印加盖纸上，留为纪念，大家赞成，纷纷取笺自写。我因陈陶遣送副总统黎元洪当选证件去武昌，代他写了一纸，留为纪念。八时，总统就职典礼开始，大家拥了中山先生到大堂。此时新军九镇的士兵，从大门起左右站立，五色国旗飘拂直达大堂阶前。司议员是第九镇统制徐绍

楨，唱鸣礼炮，炮声二十一响后，即开始了。我站在礼台左侧边，总统向南立，右边是代表景耀月，左边是总统秘书长胡汉明。总统举左手宣誓毕，景耀月代表致颂词，胡汉民代总统谈答词，总统亲谈就职宣言。我手持大总统印授总统，总统受印，交秘书长盖印于宣言上。这庄严的典礼以在夜间的原故，南京当时的摄影者未有镁光的设备，不能摄一照片，可惜得很。礼毕，总统开夜宴，招待各省代表及来宾，宴毕已十一时，各代表辞归，总统亲送出至大堂。各代表请总统留步，中山先生说：“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总统是人民的公仆，各位是主人的代表，礼当送至阶下。”乃在阶下握手而别。

周应时将军传略

沈维岳

周应时，号哲谋，字志奎，启东县久隆镇人。家里经营豆腐、面食业。生约光绪十年。于光绪三十二年入南京陆军学校，旋又被送入日本振武学堂，再转士官学校。宣统元年毕业回国，赴京朝考，录为武举，授副军校职，任南京陆军学校教习、候差。辛亥革命时响应起义，先任团长，旋升旅长。孙中山在南京就任大总统期间，周加入国民党。袁世凯窃国之后，周参加二次革命，率军北战徐州。一九一三年冬，周又去日本，接受孙中山指派，开办“浩然军事学社”于日本大森新井宿。周自任“筑城学”教育。一九一四年六月，孙中山决定成立中华革命党，周率军事学社学员一百五十多人一起参加，旋被孙中山指定为讨袁军江苏方面负责人，议为江苏督军，以图三次革命。是年冬天，周与陈其美、吴藻华以及启东同乡施方白先生等一起受孙中山指派回到上海，指导倒袁革命。周负责江苏方面军事斗争，曾派出伏龙等前往南通组织暴动，曾去苏州向驻军进行策反工作，秘密活动于沪宁一线。后因中风瘫痪，长期养病。北伐之后，定居南京，挂职军事参议，领中将衔。抗战前一年病死，葬于紫金山麓。

我参加辛亥革命前后

施方白

我于1910年在上海美术学校学习时，同学黄梁和我最为亲密，每于课余，常约我游张园、愚园、留园等处，在缎山草地等人迹稀少之地，他就咬牙切齿的大谈满清入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类的惨案。谈了数星期之后，这位黄同学见到我非常同情了，他就语正词严地对我说：“你要知道满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列强要瓜分中国，炎黄子孙有当亡国奴的危险呀！你想想看看可恨不可恨！？”于是我说：“这当是可恨的事！”他于是亲密地和我握手，并且说：“你既然认为这是最可恨的事，那么我们合力想法推翻这满清政府”。我亦顺口说：“好，好”。第二天散课后，就和我谈同盟会的组织情形而劝我参加，我当时十分兴奋地答应了他。他后来再次试探我，考验我。过了十余天的晚上始约我办加入同盟会手续。主盟者是蔡元培先生。约在两三星期后，黄同学又同我在另一个地方见蔡先生，同座者另有两人，随便谈话至三、四小时之久。其后与上海盟方常有联系。不过除了接到如《革命军》、《哀江南》等小册子外，从没有收到过具体的、有计划的关于革命教育的书籍。

1911年在县立师范教课，曾在报上发表了我一篇充满着改变现状的文章。由一位举人帮我修改的。自后一般人渐渐地认为我的社会地位增高了。更有年相若的亲友和同学们鼓

励帮助，居然不化一文以六十一票当选了县议员，在县议员中又选为参事员。当时要当选议员须年纪二十五而每年纳粮赋在两元以上。可怜的我，家中所耕者全部是租田，正税不归分文，而且年龄只有二十三，显见没有当选议员的资格。但是有人帮我用偷天换日、移花接木的办法来欺瞒了官厅，官厅亦故作痴聋不严格审查我的资历。是年秋，武汉革命事起——史称辛亥革命——上海响应。我于是联络同志在上组织学生军，众推我做司令，受沪军都督指挥。

1912年春，南北议和告成，家乡的议会改组，我的参事员位置仍留任。这时候的县政府当局和地方人士似乎相当重视我了。一再邀我回县任职，时正在严禁鸦片之始，当局者遂利用我“不顾名利，不为利诱”的脾气，聘我任禁烟委员，并经反对豪绅恶霸的人们的鼓励，我于是带了自卫队二三十名不分昼夜的捕捉烟鬼，特别注意于大户土劣人家。大约一个月之中，所获的烟具至少以千计，在富贵人家搜获的甚至是金镶玉嵌的东西。在一个绅富家中搜获毒物至三百余两，其余在一家搜获的毒物数十两或百两者，那是不足为奇的事。所搜获的毒品、毒具全数送交县政府，公布数量，当众销毁。

一九一三年倒袁军起，即是称二次革命，我参加陈其美组织之上海总司令部工作。党员名次三〇七号，概不发党证。开成立大会那天，孙先生演说至三小时之久。首先检讨过去革命失败的原因，其重大错误为：组织不严密，使不革命或反革命份子混入，以致受重大牺牲，而一事无成。但这是极好的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大家不要灰心，只要百折不回，革命会有成功之一日……。革命是要有牺牲自己而替大多数谋利益的决心，如果没有这种决心的人或反对我

主张的人，请不要加入我们的组织，也不许加入我们的组织！……。孙先生这段话，深深地印入我的脑府，可以当作我初步走向革命路线的指针。

是年冬，奉命秘密回上海任党务兼财务工作。因为要做地下工作，除了和当时称为坚决革命的分子如周应时、吴藻华、张继芳、施述之、茅祖权、李海秋等往来外，也与一班地痞流氓市侩等周旋。蒋介石也于此时认识。

一九一五年，陈其美辈回到了上海。袁世凯此时已公开地要做皇帝了。陈其美、周应时邀我主办《五七报》，以反对帝制而鼓吹革命，我就不留余地地将袁皇帝骂得体无完肤。当时所谓“民党”的报纸已被封闭得干干净净。《五七报》的出版，群众非常欢迎。《五七报》是晚报。始印一千，不上一星期增加到五千份，到了下午五时以后，满街是叫喊《五七报》之声，真弄得袁世凯的走狗齐耀琳、杨小川辈束手无策。于此可见报章宣传确有功效。群众力量确是伟大。骂到第二十九天的时候，帝国主义的巡捕房奉袁皇帝之命封闭，主办人“施天权”坐牢罚款。“天权”是我的化名，我还记得出狱时，陈周雇汽车迎我，送我到浴室澡身，替我换全身新衣，并添菜举杯慰劳。当时已将牢狱之苦置之九霄之外，即席自告奋勇，而以“施及人”之名继续办报，继续骂袁，不过比较敛迹一些，报名《天中》。办到正满一个月那天，有一素有往来的巡捕房探伙跑得满头大汗来密告：“捕房又要来捉你了，快快躲开啊！”这位探伙说完，一溜而去。我则一面指挥同事，将重要的东西席卷而去，一面写：“本报业已停办”字样的纸条粘贴门外，掩门而去。刚走到对面的街口，帝国主义的武装巡捕来了，真好险啊！如果没有这位探伙来送信，那我不知要坐多少时间的牢，罚多

少数目的款，或者竟有生命之险。

时有鼠胆灰色的朱熙任第二师师长驻守苏州。时常与上海的党人联系，表示愿起义反袁，并已约定发动时日。届时由周应时、吴藻华等率同志数十人，伪装各色人物分别混到苏州，预备在朱熙反正时，分任各项职务，所有印信、委令、布告统由我负责运苏。谁知朱熙因索二十万元的现款不遂而反悔，并下令驱逐。其实过去朱熙和上海党人信使往返的目的，不过想骗钱而已。

不久袁世凯刺死陈其美，居正领导之东北革命军在胶济路上得了根据地，我也前去作门下客。居正本不懂军事而才干亦甚平凡者，于是弄到四分五裂，不成样子。我偶或进言，也无多大效果。孙中山先生初派许崇智赴鲁整理，但已病入膏肓，无从下手。继派蒋介石任参谋长，也弄得一筹莫展而去。我觉得当时的党人，类多意气从事，本谈不上重视组织观点。

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凯自毙，黎元洪复傀儡登场，东北革命军被遣散。我打算以民主党人的身分共任国事。谁知，他们把门关得很紧，对于异党异派几乎一脚踢出，在段祺瑞为尤甚。这给浑浑噩噩，痴心梦想的党人们一个重大教训，我也受到了教训。幸觉悟尚早，在冬初即南返。南返后，杨注千老师，见到我连年出生入死，一事无成而发已斑白，劝我到伊家教书，以资休养。

一九二六年，因参加北伐战争，印刷事业交人接办，《江口报》停刊。我素不愿落后，在数个月前听到广东来的友人说邓演达先生是革命阵营中的前进分子，并且给我一篇邓先生的演说词，我非常羡慕。及邓先生担任了总政治部主任，我遂邀季方同志介绍入总政治部工作，以冀亲聆其教。

初任遣贛部秘书，南昌克复后调任二十二师政治部秘书，主任为季方同志。当时季方同志的左倾色彩非常浓厚，反动分子在歧视提防，且北伐部队中已全面形成“左倾”“右转”的鸿沟，常听到有秘密捕人杀人的消息，季同志当然也相当的危險。于是借端离部，秘密赴汉，主任职务由我代理。那时已经从江西过浙江到了上海。从此，反动分子的目光就转移到我的头上来了。

一九二七年，大约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二日下午，忽接到东路总指挥白崇禧的密令：“着将该部所有共产党分子全数解押来部”等语，我考虑结果，就不顾一切，将共产党员胡若愚等六七人分别给资放走。过五、六日，以我为“跨党分子”而由做特匪到今日的刘伯龙很客气的用汽车迎接我到上海警察厅坐牢。此时上海方面正在创造杀人的新纪录，我当然也到了死亡线上。后来因有共患难者施述之、茅祖权等四出营救，并深入虎穴，而得到掌握杀人权的杨虎同意，方得保出，但精神已大受损失。

摘自施方白1951年写的《施方白自传》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沈维岳

孙中山先生是我青少年时代最崇拜的伟人，他革命四十年，屡经失败，终于唤醒民众，推翻了封建王朝满清政府的统治，创建了中华民国，使中华民族有了复兴的希望。1925年三月，忽然传来他病逝的噩耗，我在家乡不禁失声痛哭。过了几天，报纸上登载了《总理遗嘱》，其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一语，对我触动很深。当时我是爱国的热血青年，也想投身革命，努力奋斗一番。第二年，在季方同志影响下，长途跋涉，到孙中山创建的革命中心广州，进了中山先生创办的黄埔军校学习。也是投笔从戎，寻找革命的真理，立志要为中国革命贡献自己的一切。

在黄埔军校学习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当时每逢星期一上午做纪念周，会上我们庄严地朗诵《总理遗嘱》，又想到中国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仍须继续努力。我们激扬地高唱校歌：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锄军阀，锄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当时，帝国主义妄想瓜分中国，国内军阀鱼肉人民，真是内忧外患，国将不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革命的出路何在？校长蒋介石常来训话。总教官恽代英，党代表廖仲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向我们做报告。广

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毛泽东也常来军校讲革命道理。他们对我们的教育很深，使我们知道要把多灾多难、民穷国贫的中国治好，达到真正的民主政治，民族平等——不受列强欺侮，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独立自主，民生富裕。要取消封建剥削制度，做到耕者有其田，达到最后实现世界大同。这都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欲实现这个理想，我们要作艰苦的奋斗。

根据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举行北伐。当时我被分配在第一军。出发之前，蒋介石任北伐军总司令。1926年九月九日下午蒋介石宣誓就职，向我们发布了讨伐军阀的进军命令。当时真是万众一心，群情激奋，誓师大会气壮山河。北伐军中有不少共产党人作政治工作，他们身先士卒，勇敢善战。叶挺部队更是所向披靡，使敌人闻风丧胆。不料一年以后，北伐事业到半途而夭折了。当时，我十分徬徨而苦恼，摸不清中国革命的出路究竟何在？在季方和施方白先生影响下，我参加了邓演达先生领导的第三党，再探索革命之路。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大片国土沦丧。我发现延安提出的一条救国之路，是中华民族的希望。1938年五月，我陪同施方白先生到延安观光。在武汉受到我黄埔军校的老师周恩来先生的热情接待和教诲。到延安后，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和教育，我遵循他的指示回我家乡启东，先后三次组织部队，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

由于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领导全国人民，经过八年的浴血抗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我先后参加过国共两党两次合作。我原来也信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在漫长的岁月中，终于找到了革命的真

理，信仰共产主义，因而在抗战期间参加了共产党。近六十年来，我从切身经历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真谛。中山先生革命凡四十年，并未求得中国之自由平等，而受尽帝国主义之欺凌。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内战连年，民不聊生，只有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帝国主义再也不敢欺侮中国人了、中国已经独立自主，中山先生的理想已经实现了。香港问题和英国达成协议，更使中国人民扬眉吐气，在历史上写下新的篇章。

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时候，我回想起在黄埔军校学习的情景，现在校友们散布在全国各地和香港、台湾海外各地，想我们当年风华正茂，斗志昂扬投身北伐，特赋诗一首：

黄埔岛边水荡漾，
尚留军校好风光，
革命征途多曲折，
园地菊花分外香。
伟人创校历艰难，
国共合作前景看，
我辈同商宜继志，
统一祖国宏图展。

和平统一祖国，是人心之所向。我希望台湾国民党当局顺应时代潮流，顺应民心，实现“一国两制”。

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我们已经实现。振兴中华任重道远。我今年八十八岁了，殷切期望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以告慰中山先生在天之灵。

（1986年9月于南通）

回忆王子贤为孙中山先生治病经过

薛祖昌

那是一九二五年二月中旬，一次特别快车从上海站出发，向北方飞驰。

这是一节软席卧铺车，房间有钢丝床、鸭绒被、沙发椅，设备豪华。乘车的大都是黄头发、高鼻子、绿眼睛、穿西装的外国客人和衣着华丽的中国阔老。只有我们这个房间里，六个人住的是三个穿着一般的中医和三个随行人员。我们负有特殊使命，才享受这样特殊的优厚待遇。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孙中山先生应冯玉祥将军的邀请，从广州抱病起程去北平，准备和段其瑞临时执政当局商谈国事。经香港到上海，绕道日本，乘船到天津，再乘车抵达北平时已年底了。他领导革命，推翻满清，创建民国，积劳成疾，患有肝病。这次长途旅行，又过于疲劳，病情恶化，到平后送协和医院治疗，未见好转。孙中山病势严重的消息公布后，不少热爱他的革命组织，相继推荐名医前往诊治，此时钮永建、茅祖权等领导的江苏公团联合会，特邀请海门名中医王子贤（原住海门里仁乡，今属启东海复乡）由南通金沙人邱啸天和我陪同往北平为孙中山治病，倪华清（邱的岳父、王的知交）以及黄凤池（文书）钱云清（工友）随行。

王子贤，人称西粮户、或西伯、西叔公。祖传中医、擅

长内科、妇科。请他看病，门诊处方每例诊金两元，出诊要有“请封”用轿子、车子接送。由于他治好过不少疑难病症，所以远近知名。有一年，他邻居王富的妻子六十多岁了。生重病，行将断气，家里人将她从床上搬到临时搭的便铺上穿上了寿衣，等着瞑目。恰巧王子贤路过她家听到哭声，走了过去仔细看看，开了一张处方交给王富说：“死马当着活马医，你煎好这方子的药能灌下去，可能还有希望。”王家听说还有希望，就马上把药买来，煎了给病人吃，病人吃后就渐渐好起来了，又活了十多年，所以王子贤在民间有起死回生的名声。

倪华清在圩角镇办国文专修科，聘请金沙人邱啸天当教员。倪见他文才很高，将女儿嫁给了他。倪家有人生病常是专请王子贤住到家里来看病，每次来邻近的病人也都来请治。邱啸天原懂些医学，后又拜王子贤为师，再学中医，那时我在国文专修科学习，邱先生叫我也学中医。邱年轻有为，接受了新思潮参加了中华革命党，去广州从事革命活动两年，后回上海的英租界牯岭路余庆里，自称“辟邪主人”，明里挂牌行医，暗中从事革命活动，那时叫我到上海当他的助手。孙中山先生北上后病重的消息传出后，邱啸天是江苏公团联合会的成员，他知道王子贤的医道高明，经邱推荐，遂有我们这次去北平为中山先生治病之行。

我们到达北平，北国仍是千里冰封，银装素裹，当即有专车接我们到中央饭店下榻。那是个高级宾馆，将我们作为上宾招待。

王子贤先生，当时已五十多岁，细高个子，长方面孔，戴副金丝眼镜，身穿长袍马褂，头戴小帽，脚穿棉鞋，还带了一根长旱烟管，走起路来微有些跛脚，那是一次坐小车出诊

时跌伤后形成的。邱啸天买了只长香烟筒子叫他抽香烟，免得人家说这位名中医太土气了。他是抽大烟的，宾馆里拿出精致的烟具和优质的鸦片，天天让他躺在床上吞云吐雾过足瘾头。

开饭时，中餐、西餐都有，凭吃的人喜欢可以任选。有一次服务员上来笑着问王子贤，你要吃点什么？北平烤鸭是名菜，猪排、牛排都有……

王子贤说：“我要蛋炒饭”。

邱啸天走南闯北，见过世面，见王子贤点蛋炒饭是太寻常了，拿出钢笔在服务员手里的菜单上写明了要云腿蛋炒饭。再加一隻鸡汁鸽蛋汤，王子贤吃了后觉得十分开心。

报纸上天天发表孙中山先生病情公报，只是不见好转消息。我们住在中央饭店已二十几天了，还没有见到通知去为孙先生看病，大家心中很纳闷。有一天，邱啸天从外面活动回来，很生气地对王子贤说：

“汪精卫见几个中医曾给总统治病不见疗效，已不信任中医。对我们也不以为意了。”

“那……我们不是白来了吗？……”王子贤非常不高兴。

北平也驻有江苏的代表，向接待人员提出，我们江苏来的名中医，你们不用，我们孙总理的如此病情是很着急的。

当时，中山先生发病后，已请过不少中外名医治疗。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协和医院为孙先生剖腹，看视诊断为肝癌晚期，剖开肚皮后只探查了一遍，又缝合好，说：

“无能为力”了，不久孙先生离开医院，住到外交部部长顾维钧公馆继续治疗，又服用中药。

在三月初的一个上午，有一辆小汽车到中央饭店来接王

子贤先生到铁狮子胡同去为孙先生看病，邱啸天和我随行。那是幢朝南洋楼，里面陈设是富丽堂皇，顾维均常在这里接待来宾。门前警卫森严。走进会客室，椅子是绣花黄缎子做的椅垫及椅披，铺有俄国地毯。我们坐了一会儿，孙夫人宋庆龄和孙科、孔祥熙、汪精卫接见我们。汪精卫问王志贤：

“老先生：你有把握看好总理的疾病吗？”

“我还没有看视把脉，怎能说看好看不好呢！”

孙夫人和他们细声商量了几句，她很客气地对王志贤说：

“请你们进去，为先生仔细看看。”

孙先生住在西边一间房间里，房子不大，陈设简朴，有四张沙发椅，一张台子，他躺在一张铜床上。我们轻手轻脚走进去，看见孙先生面容消瘦，正在闭目似睡。宋庆龄上去轻轻叫了一下，孙先生睁开眼睛望了望我们，轻轻动了一下身子又闭上了眼，我拿了本书垫在床边，王子贤为孙先生仔细把了脉，看看他舌苔，解开他的上衣扣子，摸摸先生的肚皮，有腹水。他又叫邱啸天和我上去看看、诊诊脉。王子贤问孙先生：“你嘴干吗？”他摇摇头。又问“你心里不舒服吗？”他点点头。他神志还清醒，已无力回答问话。病情确是十分严重了。

我们又退出来，到了会客室，孙夫人派人递烟送茶，招待十分客气。她焦急地问：

“王先生，病情怎么样，有否办法？”

王子贤沉默不语。

“你看还有希望吗？”

王子贤慢慢地说：“先生为革命奔走许多年，积劳成疾，发现太晚，这是不治之症，现在先生元气消耗殆尽，我怕无能为力了。你们何不请西医穿刺放水？”